

冯友兰在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探寻

李维武

(武汉大学 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冯友兰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不是从比较中西文化的同异优劣出发,在两种文化中选择一种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是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域出发,在两种文化中选择那些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内容,重新构造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文化既能够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又能够在这个汹涌大潮中不至随波逐流。冯友兰的这些思考比较深刻地抓住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症结,超越了同时代的全盘西化论者,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不足之处在于,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过分强调了从“类型的观点”看而轻视了从“特殊的观点”看,把西方文化同产业革命后形成的“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加以割裂,以为中国文化所要追求和吸纳的仅是后者而非前者,这在理论上讲是有效的,但从实际上讲这种有效性就大打折扣。

关键词:冯友兰;全球化;民族性;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4-0004-06

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探寻“贞元之际”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冯友兰哲学的一个重心。诚如冯友兰在晚年所说:“我从1915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不同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矛盾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1](自序2页)]只是与同时代的西化论者不同,也与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冯友兰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不是从比较中西文化的同异优劣出发,在两种文化中选择一种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是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域出发,在两种文化中选择那些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内容,重新构造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文化既能够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又能够在这个汹涌大潮中不至随波逐流,甚至淹没了自己。这就形成了冯友兰在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探寻。这一工作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20世纪30—40年代展开的。冯友兰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贞元六书》之一的《新事论》及《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等文,集中表达了他的有关思想。本文即根据这些文献,对冯友兰在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探寻作一考察。

一、“特殊的观点”与“类型的观点”

自严复于19世纪末比较中西文化优劣以来,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一是西化思潮,一是文化保守主义

思潮。这两大思潮的主张当然不一样,但从思维模式上看却有相似、相通之处,即都在两种文化中比较优劣,选择其中一种作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在西化思潮看来,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中国只有学习西方的文化,走西方的道路,才能避免挨打,得到复兴。陈序经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2](页139)]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认为,西方文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暴露出巨大的弊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只有弘扬中国文化的传统,才能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使现代人类得以健康的生存和发展。梁漱溟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西方文化曾在向外探索和向前开拓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现在其潜力已经耗尽,“毛病百出,苦痛万状,从前觉得他种种都好,现在竟可觉得他种种都不好”,使得西方人也感到要改换路向,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3](页504)]

对于这两大相互对立的思潮,也有思想家从不同方面作出修正,力图超越中西文化的对立,而把中西文化的关系转化成中国文化与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关系。胡适属于西化思潮的主张者,对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他由最初的完全赞同转而认为需要加以修正,主张把“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但胡适的理由,只是认为“全盘西化”的提法不够确切,要中国人百分之百的西化实在不现实,而“充分世界化”则更为准确,表达了中国文化顺应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要求。^[4](页79-84)]冯友兰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张者,但他并不赞同梁漱溟的用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张,认为不应当从文化的个性而应当从文

收稿日期:2003-04-18

作者简介:李维武(1949-),男,安徽合肥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化的共性来理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即从“类型的观点”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力图以此揭示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矛盾的现实根源与解决途径,使中国文化面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对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新解释。后来冯友兰曾谈到自己与梁漱溟的分歧:“谈到文化问题,梁先生的出发点,与我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梁先生的出发点是求异,我的出发点是求同,梁先生注重在中外的比较,我注重在古今的比较。”^{[5](页450)}

冯友兰为此提出了一套“别共殊”的理论。他认为,任何具体的事物,既有其一类事物之理,即一类事物的类型,又必然是一件一件的事物,即特殊的个体。对于一种文化,也是如此,可以从“特殊的观点”看,亦可以从“类型的观点”看。从“类型的观点”看,人类文化有共同的发展规律,都要由古代文化类型发展为近现代文化类型,这是文化的共性。从“特殊的观点”看,则每一个体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个体的文化,其中有许多是不属于类型方面的东西,这是文化的个性。人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这是从“特殊的观点”看文化;人们说“资本主义底文化”、“社会主义底文化”,这是从“类型的观点”看文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但如果从“类型的观点”看,又可以发现其中有属于共性的主要的性质和有属于个性的偶然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冯友兰据此着重批评了民国初年以来一般人专从“特殊的观点”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做法,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之所以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引出许多纷争,就在于只注意文化的个性,不注意文化的类型,仅仅从“特殊的观点”而不从“类型的观点”看中西文化,仅仅把它们理解为两种特殊的文化而不把它们理解为两种有共性的文化。而这种传统的看法,是难以说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两者关系的。因此,“近数年来,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部分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论者。无论其主张如何,但如其所谓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其主张俱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6](页223-224)}。

例如,如果仅说西方文化是一特殊的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头五光十色的“全牛”,其中的条理全然看不出来,不知其中既有属于共性的主要的性质,又有属于个性的偶然的性质。因此,在强调学习、吸取西方文化时,就必然会产生全盘西化思潮,主张将中国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完全变为西方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要求中国人俱说洋话,俱穿洋服,俱信天主教或基督教。毫无疑问,这是说不通,亦行不

通的。可见,仅仅从“特殊的观点”看西方文化是有局限性的。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必须从“类型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从“类型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就能发现西方文化有许多性质,有的是属于共性的主要的性质,有的是属于个性的偶然的性质。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文化就不再是一头五光十色的“全牛”,而能发现其中哪些是中国需要学习、汲取的,哪些是中国不需要学习、汲取的。这表明,只有从“类型的观点”看,发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各自属于共性的主要的性质和属于个性的偶然的性质,才能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作出正确的取舍。他说:“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其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同样,“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我们亦可以说,可以指出,于此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6](页226)}。

在冯友兰看来,这样一来,全盘西化论者、部分西化论者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纠缠不清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首先,“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即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就此一类说,此改变是完全底,彻底底,所以亦是全盘底”。其次,“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底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底文化。我们的文化之与此类有关之诸性,当改变,必改变;但其与此类无关之诸性,则不当改变,或不必改变。所以自中国文化之特殊底文化说,此改变是部分底”。再次,“此改变又是中国本位底。因为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底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底文化”^{[6](页226-227)}。这也就是说,中西文化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截然二分、相互对置的关系,而包括了上述的三层关系。只有从这三层关系上来把握,才能对中西文化关系作出深刻准确的说明。

因此,冯友兰强调,从“类型的观点”看中西文化问题比之从“特殊的观点”看中西文化问题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他提出:“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11](页289)}冯友兰的这一思想,与梁漱溟的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的主张相比,与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的主张相比,都更为深刻。因为冯友兰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内在根据,又揭示了中国文化保持、弘扬自身价值的内在根据,从而超越了全盘西化论者和其他的文化保

守主义者。

二、“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与 “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

从“类型的观点”出发,冯友兰着重分析了近百年来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力图说明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属于共性的根据。在这方面,冯友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中寻找这种属于共性的根据。

冯友兰指出,近百年来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在于:“在现在整个底世界上,西方成了城里,东方成了乡下。”这种城乡关系当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城里人总是欺负乡下人,乡下人总是受城里人欺负,“所以我们中国虽有的是原料,而制成品却须往外国买。我们有麦子,而所谓洋面渐渐压倒本地面。我们有棉花,而所谓洋布渐渐压倒土布”^{[6](页245)}。所谓洋面、洋布以及一切洋货者,正确地说,实即城里的面、城里的布、城里的货而已。土与洋、中与西的关系,实际上是乡下与城里的关系,两者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城乡之别呢?冯友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上,即从生产方式入手,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人类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根据,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在于“生产方法”。他所讲的“生产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产方式。他说:“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底;一种经济制度,是跟着一种生产方法来底。”^{[6](页287)}生产方法是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基础,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制度随生产方法的变迁而变迁,而“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因为用某种生产方法,必须用某种生产工具。如某种生产工具尚未发明,则即不能用某种生产方法,人亦不能知有某种生产方法”^{[6](页258-259)}。也就是说,生产方法的变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取决于生产工具的变革。西方与东方之所以形成城里与乡下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变革的结果。

在这里,冯友兰尤为凸显了西方产业革命对经济生活变迁乃至社会生活变迁的意义。他说:“我们看近代史中,有很多种、很多次的革命,其中最重要者为工业革命(即以机器工业代手工业)。此工业革命可说是近代世界所有革命中之最基本者。有了这工业革命,使别的建筑在旧经济基础上的诸制度也都全变了。”^{[1](页387)}西方的产业革命,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使得西方的生产方法由前近代的“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转变成为近代的“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即脱离了前近代的“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而建立了近代的“以社

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冯友兰专门引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下靠城里,使东方靠西方。”^{[6](页244)}正是产业革命所造成的西方经济制度的大变革,使西方成了城里,东方成了乡下,因此使得东方不得不靠西方。在冯友兰看来,“这是个基本意思。我们用这个基本意思来看历史,一切都可以看得通”^{[1](页387)}。

冯友兰进而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实际上也正在这里:“有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为生产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曰生产社会化底文化。”^{[6](页364)}西方文化是在产业革命后所形成的“生产社会化底文化”,而中国文化则仍然是小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家庭化底文化”。前者实际上是一种近代或现代的文化,后者则实际上是一种前近代或前现代的文化。因此,“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6](页251)}。也就是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6](页225)}。这样一种看法自然比笼统地说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

由此来看中国文化的出路,冯友兰指出:那就在于经过产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或现代化。通过工业化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现在世界是工业化的世界。现在世界的文明是工业文明。中国民族欲得自由平等,非工业化不可。”^{[1](页389)}“中国若不能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则所谓中国,无论它是如何底地大物博,将来会只成一个地理上底名词,所谓中国人,无论他是如何底聪明优秀,将来会只成一个人种学上底名词。所谓中国文化,无论它是如何底光辉灿烂,将来会只成历史博物馆中底古董。所以中国非求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不可。”^{[5](页432)}相反,“在这种情形下,如专提倡所谓‘东方底精神文明’,以抵制西方势力的侵入,都是绝对不能成功底”^{[6](页246)}。正因这样,他对于当时的“抗战建国”的口号,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现在所谓建国,其意义就是建立一个近代式底国家……建国是目的,抗战是手段。”^{[5](页432)}

冯友兰认为,中国找到这条道路和这个方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中国出路的结果。他说:“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末咸同时代的人,以为近代式底国家的要素是兵船大炮。光宣时代的人,以为近代式底国家的要素是有国会宪法。民初时代的人,以为

近代式底国家的要素,是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现在我们知道,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工业化。有了工业,自然会制造兵船大炮。社会工业化以后,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德先生自然会有人拥护,赛先生也自然会有人鼓励。没有工业,而只要兵船大炮,固然是沙上起屋,社会没有工业化,而只讲德先生与赛先生,也是纸上谈兵。这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中国近十年来方才认清。”^{[5](页432)}在他看来,讲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当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当然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但都必须紧紧抓住工业化这个根本。只有紧紧抓住工业化这个根本,中国文化才有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现代化。

在这里,冯友兰通过对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考察,发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矛盾的现根源与解决途径,看到了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必然性、进步性和普遍性,力主中国文化应当像西方文化一样通过产业革命而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些思想,深化了近半个世纪中人们对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理解,从根本上解答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进逼面前不断失败的本质原因,揭示了中国文化复兴于当今世界的根本途径。在这里,也显示了在文化问题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深化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内涵。

三、全球化与民族性

冯友兰在力主中国学习西方通过工业化实现近代化的同时,又强调了中国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民族性。强调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对于中国的民族性的保存和弘扬,是冯友兰文化观的落脚点。他之所以被划归于文化保守主义者,原因也就在这里。

“民族性”是冯友兰很重视的一个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写的《论“比较中西”》一文中,冯友兰就对民族性有过说明。他认为:“所谓‘文化’,‘民族性’,都是空的抽象的字眼,不能离具体的东西而独立。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民族性也是如此,他就是中国从古及今,一切圣贤贤愚之行为性格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别无中国民族性。”^{[1](页43)}这种民族性不是“已造的东西”(Something made),而是“正在制造的东西”(Something in the making),因此,“中国人一日不死尽,则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即一日在制造之中”^{[1](页47)}。在《新事论》中,冯友兰对于民族性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说:“照我们的看法,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所说底民族性,实则并不是性而是习。”^{[6](页319)}因为

中国哲学讲的“性”是先天的本质,是不变的,而“习”是社会影响的结果,是可变的。在制度不同的社会内,人们的“习”当然不同;即使在制度相同的社会内,因社会某一时代风尚不同,人们的“习”亦有不同。冯友兰不主张用“民族性”这一说法,但他并未否认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只是这些性格和特点不谓之“性”而谓之“习”。这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之“习”,他又称之为“国风”,认为“一国可有一国的国风”,这种“国风”有的是“一贯底”^{[6](页355-356)}。在这里,冯友兰实际上是突出了民族的性格和特点,而不是否认有民族的性格和特点。这与他强调的中国必须学习西方通过工业化而实现近代化是一致的,因为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特点。因此,冯友兰并未否定民族性的存在,他所否定的只是那种恒定不变的民族性的存在。正如曾经师从冯友兰的俄罗斯学者基达连科所说:“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这一思想是相当有益的,它好像一根主线,把冯友兰教授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联结起来了。”^{[7](页158)}

冯友兰认为,通过工业化实现近代化,固然是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但并不因此而消解了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正因为有这种文化的个性的存在,因此两个或几个民族虽在同一文化类,但仍然可以分别出某民族是某民族。用他的比喻说:张三是科学家,李四亦是科学家,科学家之类是公共的。但张三是科学家,不失其为张三;李四是科学家,亦不失其为李四。张三可在李四是科学家之方面学李四,但他所学者是李四之为科学家,而不是其李四。张三、李四,除同是科学家外,在别的方面,张三自是其张三者,李四自是其李四者。他又举例说:“从文化类的观点看,英国是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德国亦是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从文化类的观点看,英国德国在此方面是相同底。但我们并不能说德国已为英国所同化了。因为从文化方面看,德国与英国还有其异在,这些异,从生产社会化底文化的类的观点看,是不主要底,而在区别英国之为英国,德国之为德国,却是很重要底。”^{[6](页30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中国文化除了与西方文化具有共性之外,还有自身的个性。中国文化固然要像西方文化一样从前近代文化转变为近代或现代文化,但不论前近代的中国文化还是近代或现代的中国文化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都离不开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个性、特殊性,即自身的民族性。也就是说,不论前近代的中国文化还是近代或现代的中国文化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都离不开我们“这个”的个性、特殊性,都离不开我们自己的民族性。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的看法是注意于其所代表之文化‘类型’。如此就看出来,其中分子何者为相干,何者为不相干。所谓西洋文化是代表工业文化之类型的,则其中分子,凡与工业文化有关者,都是相干的,

其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我们要学,则所要学者是工业化,不是西洋化。如耶稣教,我们就看出他是与工业化无干的,即不必要学了”^{[1](页391-392)}。这就是说,如果仅从“特殊的观点”来看中西文化关系,中国人要学西方文化就只能是整个地学,即搞“西洋化”;而如果从“类型的观点”来看中西文化关系,中国要学西方文化就只须学其类型,所学者是“工业化”而非“西洋化”。因此,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并不改变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并不改变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

那么,在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化在学习、吸取西方文化实现工业化、近代化的同时,能够保留哪些属于自己的个性的东西呢?冯友兰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质”与“文”这一对范畴,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清末人常用‘体’‘用’二观念以谈文化。我们于此,可用‘文’‘质’二观念,以说明我们的意思。”^{[6](页306)}所谓“质”,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所谓“文”,指的是一个社会的艺术文学、精神道德。对中国来说,“质”的方面是要通过学习西方文化而加以变更的,而“文”的方面则有许多是不需要学习西方文化而加以保留的。

在冯友兰看来,由儒家、墨家、道家建构的中国精神道德传统,就是这种“文”的内容。中国自古及今的重视道德的国风,是不会因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而根本改变的,在现时代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面对抗日战争的艰苦局面,冯友兰认为这种精神道德传统,对于中华民族渡过困难、贞下起元,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动情地说:“中国自商周以来,有一贯底一种国风。此种国风是: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在这种国风里,中国少出了许多大艺术家,大文学家,以及等等底大家。但靠这种国风,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几个短时期外,永久是光荣地生存着。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项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底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6](页355-356)}对于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抵抗力之强,一些西方人甚为惊异,大惑不解,冯友兰对此作了回答:“若问: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能使中国人以庄严静穆底态度,抵御大难?我们说:此力量,普通一点说,是上所说底道德力;特别一点说,是墨家儒家的严肃,及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6](页365)}因此,冯友兰认为:“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6](页364)}那种把生产方法、社会制度与基本道德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对的。生产方法、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

可变的。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者则没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

冯友兰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及其语言,也是属于这种“文”的内容。他说:“一个民族,只有对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才能充分地欣赏。只有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里,才能充分地得到愉快。就文学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跟着它的语言来底。一个民族的语言,只有一个民族内底人,才能充分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整个生活所造成。若有一人,对于一个民族语言中底每一个字,皆能知其在各方面底意义,每一个字,皆能用得恰当,此人必须是对于此民族的整个历史,整个生活,皆已有充分底了解……各民族必须宝贵它自己底文学,自己底艺术。这并不是专为区别它自己,而是因为只有在它自己底文学艺术中,它的生活,才能充分地充实,充分地丰富,充分地愉快。”^{[6](页308-310)}因此,“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艺术文学。而从文化方面以区别各民族,则其艺术文学是最需要注意底”^{[6](页303-304)}。文学艺术当然也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提倡用白话来写作,但新文学和白话文不是要用欧洲语言来写作文学作品,并没有离开中国语言来写作。也就是说,“既是文学,它总是用言语写底。它既是用言语写底,它必须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既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如写得好,即不仅是某民族‘的’文学,亦是某民族‘底’文学”^{[6](页314)}。因此,冯友兰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了,所以中国底文艺亦要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6](页314)}

总之,冯友兰认为,在中国自觉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尽管这个运动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尽管中国必须积极吸取西方的知识、技术与工业,但中国文化仍然有自己的不需要学习西方文化而加以改变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的,是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积淀而成的,因而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特色。“中国人”过去之为“中国人”,是依靠了这些性格和特色;“中国人”现在之为“中国人”,亦是依靠着这些性格和特色。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来说,一方面需要积极地学习、汲取西方的知识、技术、工业,另一方面则需要努力地继承、弘扬中国自身的精神道德、文学艺术。在这里,开来与继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四、结语

冯友兰以上的这些思考与探讨,在今天看来,既有其积极意义,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冯友兰的这些思考与探讨的积极意义在于:看到

了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揭示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和霸权形成的经济基础,指出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矛盾所包含的社会形态内容,点明了中国人吸纳西方文化的基本内容与必然趋势。同时,冯友兰又指出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各有自己的个性,强调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有自身价值和存在理由,不赞成把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前途理解为“西洋化”或“东方化”之类的单一世界文化。总之,中国自觉地加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保存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这样一来,冯友兰不是在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只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试图在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寻找一种必要的张力。他的这些思考和探讨,可以说是比较深刻地抓住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症结,因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全盘西化论者,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

冯友兰的这些思考与探讨也有不足之处:即过分强调了从“类型的观点”看,而过分轻视了从“特殊的观点”看。这就使得冯友兰把西方文化同产业革命后所形成的“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加以割裂,认为中国文化中所要追求和吸纳的仅是后者而非前者,如此一来就能保持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必要张力。但这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在西方文化显示出强大的优势和霸权的今天,更是如此。西方文化之所以产生世界性的巨大影响,对非西方文化形成优势和霸权,也正在于它自身首先孕育出了产业革命并形成了“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因此,全球化既包括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世界性扩张,也包括了产生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扩张。这种西方文化扩张的势头,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日益加速,在今天越来越强劲。

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西化思潮,其流变至今未绝,并不只是一个看问题方法不正确、不全面的问题,而实是与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相联系的,反映了近代化与现代化同西方文化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正因这样,冯友兰过分强调从“类型的观点”看,从理论上讲是有效的,但从实际上讲这种有效性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今天,要保持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必要的张力,无疑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方能奏效。

总之,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今天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时代大问题。尽管冯友兰未能完全解答这一问题,但他所作的这些探寻,不论是积极的内容还是不足之处,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都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 [2]杨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4]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A].全盘西化言论三集[C].广州: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研究出版股,1936.
-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7]基达连科.融合欧亚文明的思想家冯友兰[A].解读冯友兰·海外回声卷[C].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裴 喆]

Feng Youlan's Prob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LI Wei-wu

(Philosophy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Feng Youlan's thought and probe into the problems of both China and western culture do not begin with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ut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he took the content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reasonableness as the developing way of reforming Chinese culture, making it in step with the world culture but not just drift along. Feng's ideas went beyond this contemporary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and other cultural conservatists. However, he also had his weak points which extremely emphasized the type viewpoint and neglected the special one, separating western culture from the productive social culture formed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lding that Chinese culture should follow the latter not the former. This idea is only meaningful in theory not in practice.

Key words: Feng Youlan;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culture